

中美贸易摩擦:成因、应对措施与启示

张 震 王建斌

内容提要 美国宣布对我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加增25%的惩罚性关税,中国政府宣布同等规模的相应反制,以此为标志,中美贸易冲突正式爆发。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美贸易冲突的特点是规模大、成因复杂,以贸易逆差、核心经济安全等为诱因,遏制中国经济发展、转移国内矛盾等为动机。贸易冲突本身及其引发的系列后果,必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对此,中国必须做好准备措施,冷静应对。在对中美贸易冲突的成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采取的举措和谈判策略,并总结此次贸易冲突所引发的深刻教训和启示。

关键词 中美贸易冲突 贸易保护 贸易壁垒 关税 产业政策

张 震,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210004

王建斌,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210037

一、引 言

2017年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对我国贸易、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各方面做出一系列指责,宣称美国在以往的美中经济交往中是受害者,长期对华不平等贸易使美国的知识产权、就业和国家财富遭受损失,多次威胁并采取措施对中国进行经济报复。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我国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征收最高税率达30%和50%的关税;3月9日,特朗普又签署关税法案,对我国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2018年7月6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表示还将对1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面对此局面,中国政府立即宣布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征收相同的关税进行反制。自此,中美贸易冲突正式爆发。2018年9月24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增10%的关税,同时计划2019年1月后将该税率提高到25%,并表示如果中国报复,将对中国价值5000亿美元的全部出口商品加增关税,贸易冲突逐渐升级。

贸易冲突在国际贸易史中并不罕见。当代国际贸易理论表明,自由贸易虽然能够提高各国整体福利,但贸易对国内各个产业利益群体影响不一,各种利益集团都有促使本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自身产业的动机,因此国家间的各种贸易摩擦不断。但此次贸易冲突具有一系列新的特点值得重视:首先,此次中美贸易冲突规模较大,且有升级的可能。特朗普多次提及如果中国反制,将对中国价值5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这接近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全部商品价值总和,在这种情况下,这将成为二战后规模最大的贸易冲突,也使中国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其次,美国政府的利益要求不明确,行为不可测。特朗普政府含糊地指责中国各种政策,并不断改变其攻击方向,使中美双方多次沟通达成的结果无法实施,谈判异常艰难。此外,特朗普政府在此次贸易冲突中的各种行为冲动、强势,在中方对美国采取正当的反制措施后不仅不反思,反而于2018年9月24日再次宣布计划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试图挑动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被中国商务部指责为丧失理智的行为。基于中美贸易冲突的新特点,中国必须及早准备、严肃对待。本文将全面分析此次贸易冲突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讨论中国应采取的举措与未来谈判策略,并总结此次贸易冲突所带来的教训和启示。

二、成因分析

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冲突表面上是对中美贸易现状和中国长期持续的对美贸易顺差的不满,要求中国降低贸易壁垒,增加对美商品购买,减少美中贸易赤字,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可能是促进美国制造业扩张、转移美国国内矛盾,乃至遏制中国科技进步、阻碍中国经济崛起等。

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对华长期商品贸易逆差是特朗普政府挑起此次贸易冲突的主要借口。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贸易额为5054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商品出口为1298亿美元,贸易逆差为3756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认为贸易逆差反映了中美两国在相互贸易中所得利益差距,美国从美中贸易中受损而中国获得了更大利益,因此要求中国政府降低关税,增加美国商品进口、减少贸易逆差。实际上关于美中贸易逆差是否对中国有益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诸多共识,其中一点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出口了更多的实际资源,得到的却是美元货币和收益较低的美国国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本稀缺、消费水平较低的国家,这是一种损失而不是利益。根据当代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学模型长期贸易顺差导致了中国政府购买了大量美元,被迫增加了人民币的供给,造成国内流动性泛滥,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我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这也是我国政府希望避免的。美中贸易逆差形成原因主要有: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不得不持有一部分美元资产储备;美中两国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存在很大差异,美国储蓄较低,中国的储蓄率则相对较高,美国需要从中国吸收资本来维持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的加工贸易环节,各种中间商品在中国装配后出口到世界各地,贸易逆差不能反映美中两国在双方贸易商品增加值上的差异。例如手机和电脑产品,虽然贸易逆差数额很大,但中国在此类产品增加值中所得很少,逆差只出现在美中贸易账户上,但反映的是美国对日韩等中间产品生产国共同的贸易逆差。总之,美中贸易逆差是多种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不能说明美国从中受损也不能说中国是受益者,美国以此为借口挑起贸易冲突纯属强词夺理。

首先,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设置对中国商品进口贸易壁垒,促进本国中低端制造业扩张,改善美国蓝领工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是此次贸易冲突的重要动因之一。实际上美国在科学研究、高等教育等领域的优势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造就了美国在诸多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但也增

加了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和就业压力,很多普通美国人无力与通过重重选拔的全世界精英相竞争。总之,美国在信息技术、金融服务、高等教育等优势行业的大量贸易顺差,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美元储备的追逐,推高了美元汇率使美国在部分中低端制造业丧失竞争优势。再加上当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与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也减少了对制造业劳动力的需求,使部分美国蓝领工人失去工作。特朗普不正地指责中国是所谓的“工作盗窃者”,宣称中国应当为美国制造业的衰退负责,采取对我国部分出口产品增税的形式以保护国内制造业,这是本次贸易冲突的重要诱因。实际上,美国制造业的现状系其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全球化等多种因素造成,中国人民与企业不应对其负责,特朗普的指责毫无道理。国际贸易的本质在于贸易各方通过比较优势互补来促进参与方共同的福祉,而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美国占领了生产价值链的最高端,获得了最大的贸易收益,中国企业则由于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相对低端,长期承受着低工资和相对恶劣的劳动环境。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为全世界提供了大量质优价廉的工业品和生活品,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做出了贡献,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其次,美国政府试图遏制中国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确保美国在计算机软件、芯片等高科技行业的国际领导地位,也是美国发动此次贸易冲突的重要动机。随着世界各国越来越深入地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对价值链地位的追逐成为当前国际经济竞争的重点。当代国际分工理论表明,占据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高端意味着更稳定的需求、更大的产品定价权、人才吸引力和商业利益,为获得更大的国际分工收益,各个国家都有通过各种产业政策扶持本国企业的冲动。特朗普政府对我国近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千人计划”等产业和科技振兴计划极为警惕,不断攻击中国产业升级、知识产权与人才引进等各项政策,声称中国当前技术进步威胁了美国的核心经济利益,并试图通过大规模贸易冲突的形式强迫中国放弃发展科技的正当权利,阻止中国企业向国际产业链更高端迈进以保证美国在计算机芯片、软件、通信技术等行业的领导地位。事实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将逐步拥有更多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科研实力和产品创新能力也将快速增强,在不久的将来完全可以培育出一批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公司,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

再者,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制造中美贸易摩擦,挑拨中美关系,激发美国民族主义情绪,转移美国国内矛盾,也是导致此次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重要因素。受全球技术进步、美国产业结构变动,特别是前几任美国总统的减税政策的影响,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在过去数十年日趋明显。在美国人均GDP较高的增长数据下,美国普通公民的生存环境包括工资水平、就业质量、社会保险等方面改善缓慢,甚至出现倒退。二战后,美国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逐渐演化为两级分化严重的金字塔结构,金字塔尖的精英占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普通民众对现状的不满与日俱增。长期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导致社会各个阶层间出现了严重的隔阂与利益冲突,这是美国内部长期存在的政治问题。特朗普无力弥合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在其上台后通过不断攻击美国的贸易伙伴和WTO组织,宣称美国是国际经贸来往的受害者,而中国则是受益者,引导美国公众把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转嫁到中国及其他国家身上。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美国国内的主要问题,如果特朗普政府果真要促进美国平等,就应该采取必要的增税行动提高财政收入,增加转移支付减轻国内收入差距,或者通过教育和医疗体系改革,提高社会阶层间流动性与生活保障水平。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却反其道而行,采用供给主义的政策思路,通过减税政策迎合社会中上层,通过增加企业投资、促进消费以推动经济增长,这可能有一定的短期效应,但带来的将是美国政府不断上升且未来不可承受的财政赤字和更严重

的社会不平等后果。

最后,此次美中贸易冲突的爆发与升级也和特朗普本人性格因素有关。特朗普性格冲动、强硬且有着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他对各种卓有成效的国际经贸交往规则不屑一顾,无谓指责中国及其它贸易伙伴是美国工作的窃贼,把中国引进吸收各国先进技术的正当合法行为说成是窃取知识产权。特朗普政府发动的美中贸易冲突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已经严重破坏了现有国际经济交往规则,伤害了正义和公平原则,不但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困难,亦将使美国经济自身陷入更深困境。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更试图通过采取对外强硬行为,推动美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借机提高其国内支持率。

总之,中美贸易冲突成因复杂,这也意味着此次贸易冲突必将长期持续,并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因此出现重大转变,中美双方长期合作互补的伙伴关系将正式转变为竞争对手关系。美国政府的诸多不合理要求,特别是美国把某些高科技领域视为禁区,要求中国放弃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公然破坏了国际经济交往的公平准则,与中国核心经济利益诉求严重冲突,可以预见,此次中美贸易冲突的解决亦必将面临重重困境。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诸多指责缺乏逻辑依据,其遏制中国经济强大和科技进步的意图完全不能接受,但中兴通讯事件让我们意识到,当前中国在计算机芯片等核心技术上仍受制于美国,加之国内经济也面临诸多难题,还是要尽量避免事态扩大而影响国内稳定发展大局。对于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中国的应对方式总体上仍需保持适当的克制和冷静,在对美国采取相应反制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贸易冲突带给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应对措施主要有:

一是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由于中美贸易额规模并不对等,因此在反制措施中,中国应采取最具针对性的策略,如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应主要针对美国商品替代弹性较大的行业,如在农业、汽车制造业乃至飞机制造业等方面,由于此类行业具有市场竞争激烈与需求弹性小的特点。因此,对这些行业加增关税会显著降低中国对美国产品的进口需求,进而影响到美国政府短期最关注的制造业就业增加。随着贸易冲突升级,在必要时还可采用进口配额的方式限制美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

二是人民币适度可控贬值。国际外汇市场对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反应强烈,2018年6月,人民币单月贬值接近4%,是多年来幅度最大的一次。根据传统宏观经济学中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人民币的适度贬值可以有效降低美国增加关税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的税收损失,保持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稳定对美出口。如果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中国对美出口下降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冲击,为了稳定外部需求,人民币贬值幅度应进一步提升,在此过程中应当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防止资本外流,保障中国外汇储备安全。

三是充分应对贸易冲突可能引致的宏观经济效应。DSGE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如果贸易冲突控制在50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GDP增速将会下降0.25%,损失在可控范围内,但如果贸易冲突升级达到2000亿甚至5000亿美元的规模,将对国内宏观经济稳定产生较大冲击。贸易冲突规模的扩大会直接导致国内企业对美出口的减少,由此带来的宏观经济形势不稳定,会通过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机制影响到企业投资计划,进一步降低国内总需求,冲击就业和宏观经济稳定。外部需求的不稳定还可能对国内资本市场产生冲击,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下跌可能引发经济衰退。中国当前的宏观杠杆率已

经较高,如果贸易冲突规模进一步扩大,则需要实施相对扩张的货币政策,以降低利率,并增加货币和信贷供应,促进企业投资,同时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以稳定总需求。

四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鼓励人民币结算的国际交易。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可能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加大,进而导致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上升,从而对中国正常进出口贸易造成负面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减少中国和其它贸易伙伴国的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促进中国对相关国家的经贸往来,同时还能减少外汇交易需求,减轻贸易冲突带来的外汇储备下降压力。对愿意用人民币结算的对外贸易业务,可以适当降低关税。在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中,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对相关贸易国采用人民币结算;中国对非洲等国的直接援助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可以采用实物方式结算,价格参考当前国际价格;加快提升国内金融服务业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国内的金融机构进军欧洲、南美等人民币影响较弱的地区,提供各种便捷的人民币业务,增加人民币交易在当地的市场份额;此外采取措施加快人民币官方债券业务的发展,增加国债和企业债的流动性也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措施。

五是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开放,采取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经济杠杆率偏高,产业结构调整等诸多问题,部分制造业企业利润下降,贷款困难。在此背景下,美国加增的大量关税将导致部分出口行业、地区的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对此我们必须认真面对。首先,针对受贸易冲突影响较大的部分行业应适当降税减费,增加信贷支持。我国当前的企业税费相对于国际平均水平总体偏高,已经影响了企业的投资 and 创新能力,这一现象引起了企业家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为减轻贸易冲突的负面影响必须适当减轻企业负担。对于个别影响严重的产业,可以利用我国对美国产品加增的关税进行补贴。各级政府要深入基层调查,了解企业的具体经营状况,尽可能减轻贸易冲突对企业经营和地区就业的冲击。各大金融机构也应采取政策增加对相关行业的信贷支持。其次,进一步扩大开放,尽可能降低我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我国应与欧盟,日本等地区和国家保持外交上的良好关系,适度降低我国与其它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壁垒,增加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继续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增强中国企业与产品在沿线国家的影响力;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通过技术创新增加产品国际竞争力,向国际分工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使我国产品具有更强的不可替代性;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放宽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外资准入门槛,促进市场竞争,提高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质量;最后,以贸易冲突为契机继续深化改革,减权放政,减少行政审批,提高政府运作效率,改善企业投资经营环境。

六是保护美中企业和居民的正常经济交往不受影响。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仅仅是特朗普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既不能代表美国商界,也不能代表美国民众。在进行必要反制的同时,中国还需保持冷静克制的态度以维护中美经济交往大局,不随意扩大打击面,切实保护在华美企的利益。应适当减少民族主义宣传,避免激发民族情绪,以免给特朗普政府扩大事态提供借口。

四、结论与启示

此次贸易冲突表面上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各种经济政策的不满,但其产生根源在于美国内部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当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冲击着社会阶层的利益格局,一方面需要高科技人才从事研究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低技能人员从事简单的生产制造工作,对中等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则在不断减少,导致社会工资差距拉大。随着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不断渗透,经济不平等将对各国社会稳定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从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可以看出,即便是美国这样强大富裕的国家,如果没有

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和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手段,其经济不平等也会导致社会阶层的高度分裂,威胁国家稳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程度也在日益上升,如何将不平等程度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保障各个社会阶层共同分享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的福利是我国未来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课题。

从长远来看,中美贸易冲突对双方都会造成实质性伤害,一方面既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危害到美国公众福利。中国对美国产品的关税反制将沉重打击美国农业和相关制造业,美国对中国商品增收关税也会引起美国国内消费品价格上升,从而影响美国生活水平。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的巨大压力,以及实现利益诉求的需要,都将驱使特朗普政府走上谈判桌。因此,在未来的贸易谈判中,中国应注意以下事项:一是中国应坚守的原则是,对于关系到国内发展和稳定大局的问题绝不退让,但在某些具体政策上则应当保持适当让步的态度以促进问题的解决。二是关税政策是未来谈判的重点,中国在这方面有较大回旋余地去争取谈判的主动。美国当前对华商品贸易主要集中在农业、汽车制造和计算机芯片等高科技领域,一方面,关税税率下降不会给政府财政收入造成很大冲击;另一方面,降低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可以大幅提高消费者福利,同时可通过增加补贴减轻对国内农业和农民造成的冲击;此外,在特朗普政府高度关注的钢铁、铝等有色金属领域,国内存在产能过剩、价格偏低的情况,此时关税降低对相关产品的企业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在这些领域做让步有利于获得谈判的主动权。三是对知识产权方面的谈判保持适度的灵活。一方面,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欠缺,不仅影响了美国企业的利益,同时也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激励乃至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我国在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技术专利等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加大对破坏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企业的创新成果。我国应当继续鼓励中国企业使用合法手段,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吸收、引进国外技术,以及通过并购高科技公司的方式获得核心技术。

中国国有企业的地位不应因此次贸易冲突的影响而削弱。美国政府对某些重要领域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多有指责,认为当前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制度提高了相关行业进入壁垒,使美国企业面临不正当竞争,对此我们应据理力争。我国金融、电信、铁路、烟草等行业国有大型企业垄断地位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而且从现实来看,该制度运行良好。从国内高铁的成功和移动4G网络的普及来看,国有企业并不像部分经济学家依据市场原教旨主义判断的那样效率低下。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相关行业自然垄断的特点常常使得这些行业被个别财团乃至几个家族控制,反而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程度,阻碍社会阶层流动,不利于促进人民共同福利。实践表明,当前国内大型国有企业能增强政府经济政策的执行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促进社会平等。因此在应对策略中,可以适当开放部分行业业务领域,但必须确保国有企业现有地位不受损害。

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指责,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通过产业政策对国家发展的重点战略性行业进行扶持,这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的通例,并无不妥。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产业政策在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增强本国重点产业竞争力上都起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当前实施的“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振兴计划是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应该认识到,当前中国的产业政策过于微观,侧重于直接补贴的形式向企业提供资金扶持,这在引导企业投资方向的同时,也会带来较多负面效应,例如部分企业不花精力去研究、改善产品竞争力和提高生产效率,而是通过揣摩国家政策、处理和政府的关系以得到更多优惠。各种寻租行为影响了社会风气,破坏了市场竞争环境。此次中美贸易冲突或为解决这些国内问题,促进产业政策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国内未来的产业政策应当更宏观、更具指导性,尽量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减少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直接干预。产业政策

的重点应当放在增加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提高我国急需的科技人才生活待遇、改善企业投资环境、促进相关产业有效区域集聚等方面,在不影响国内产业结构开放的大格局背景下,为了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可以根据美方要求对国内现有产业政策进行适度调整。

通过此次贸易冲突,还可以看出掌握核心技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缺乏核心技术使我国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如美国一旦停止对我国计算机芯片、操作系统等商品的供应,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伤害。从目前形势看来,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我国科技进步有着强烈的警惕,遏制、阻碍我国核心技术发展将是其长期一贯的战略。我国必须走自主研发的道路。虽然一定时期内,在某些相关领域,会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部分研究可能长期得不到商业上的回报,但可以保证我国在受到重大外部冲击时有可用替代品。我国应当增加资金投入,提高科技人员待遇,改革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完善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加速在这些领域的技术追赶。

从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等关键指标来看,中国与美欧等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既是我们需要奋斗的目标,也是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中国的强大,首先在改善本国人民生活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福祉的提升。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当前的根本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的生活的向往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切的努力是为了提升人民的幸福感,而这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追求,这也要求我们在进行对外贸易中,需要关注贸易伙伴国人民的消费需求,适当地调整贸易结构,为全世界人民生产出多样化、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总之,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只会使世界更稳定、更富裕,将会增强全球面对贫穷、疾病、战争、自然灾害等共有威胁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蔡兴、刘子兰:《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贸易逆差》,〔北京〕《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10期。
2. 戴翔、张二震:《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发展道路再思考》,〔成都〕《经济学家》2018年第1期。
3. 王建斌:《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与宏观经济稳定——基于块外生的SVAR模型》,〔南京〕《现代经济探讨》2017年第10期。
4. 戴翔、张二震:《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本质及其应对》,《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5. 廖泽芳、李婷:《汇率传递异质性对中美贸易失衡的解释》,〔上海〕《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
6. 洪银兴:《进入新阶段后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5期。
7. 朱维巍:《究竟谁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因——来自中美分行业产品异质性视角的经验证据》,〔上海〕《世界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
8. 蔡兴、刘子兰:《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贸易逆差》,〔北京〕《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10期。
9. 余永定、覃东海:《中国的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北京〕《世界经济》2006年第3期。
10. 林毅夫:《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北京〕《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第3期。
11. 沈坤荣、曹扬:《以创新驱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12. 习近平:《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推动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方向发展》,〔北京〕《人民日报》2017年1月23日。

〔责任编辑:如 新〕